

青春毕业,成了岁月(2)

◆ 宋梅

“77级”高考毕业生的人生

1977年,17岁的张晓蓉高中毕业,正打算好好放松一下。爱听收音机的父亲从广播里获悉一条重大新闻——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于是,他马上通知女儿:抓紧时间复习备考。

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10月21日见报,离开考日期只有一个多月,因此也是史上最为仓促的一次备考。据记载,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高达570万人,录取人数为27.297万人。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被称作幸运的“77级”。

张晓蓉一边翻着她的毕业留言簿,一边对记者如数家珍地指点着她的同学和她的校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的故事。

张晓蓉是幸运者中最幸运的人,高中刚刚毕业,所有的功课都还没落下。她是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那一年,幸运地走进大学校园的多是历经磨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年龄最大的比张晓蓉年长十五六岁,“入学时孩子都上小学了”。

他们是饱经沧桑的一代。少年时期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青春时代被“十年浩劫”蹉跎了岁月,在广阔农村艰苦地熬着。而恢复高考如同他们的救命稻草。

94版《三国演义》的编剧李一波也是这一代人。1978年的夏天,他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走进干净整洁的宿舍,他禁不住纵情呐喊:“哥们受苦受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1969年8月,年仅16岁的李一波,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过拖拉机,当过机枪手,伐过木,修过战备公路。后来又转战到河南插队,之后进工厂当了工人。出身不好的他,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里备受歧视。

1978年是全国艺术院校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北京考区有3000多人报考,只录取20来人,真正的百里挑一。“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所以我们都酷爱读书,不能忍受精神世界的贫瘠。”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必将人才辈出。”

1977级的27万大学生中,有一位叫李克强。

1982年,张晓蓉毕业时,班上最瘦弱、最老实的一位女同学,因不满把她分配到四川最偏远、最贫困的山区工作,竟然天天到系办公室静坐。一个半月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有了一个满意的分配。

他们这一代人,真的苦怕了。“医海茫茫无边际,我与老弟共学医。如今弟要进京,兄却不知去哪里?愿弟早日拿博士,愿弟不忘兄情义。但愿这天能到来,你我能够重相聚。”

——山东昌潍医学院1987届毕业生刘建军给冯新恒的毕业留言

留京,入沪,类似这样的关键词几乎可以代表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主旋律。

1962至1972年这十年出生的人,躲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避开了计划生育,错开了上山下乡。他们上大学时是公费的,大学毕业时是包分配的,在精神境界上“尚有理想”。

当然,对他们来说,最实际的“理想”还是留在大城市。尤其对于那些来自偏僻小山村的人来说,这几乎就是上大学的根本目的。

“打死也要留北京,要饭也不回县城。”那时候的很多人都咬着牙发出过类似的誓言。

留在大城市的渠道,那时候大致有这么几条:学校分配指标、自己托关系找到指标单位、自己上指标单位硬磕死啃、留校。对于女生来说,还要加上一条:嫁个“好人”。

于是有了勾心斗角,有了明争暗斗,有了反目成仇,有了单位领导到校园里“选拔”儿媳,有了名牌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到工厂里当焊工。

转眼间,毕业已逾20载,这些人大都人到中年。翻开毕业留言册,他们充满了感情,至今说起在火车站泪别的情景,眼圈依然泛红。他们的同学聚会相对较多,大家尽管在财富和地位上都已出现了差异,有的还很大,但因此而产生的隔阂已没有前辈们那么显性。聚会时大多只叙同窗谊,不理现实景。

他们聚会时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是如今的老花眼和白头发。

在《中国周刊》记者对各个年代毕业生的采访中,这个时期的毕业生,总体而言,同学感情最深,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最紧密。

“从没想象过的路,走过去是另一番风景。祝明天的你海阔天空。”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96届毕业生张景春给同学赵凤的毕业留言

有两首名为《海阔天空》的歌曲,都很著名,一首是BEYOND,一首是信的。这两首歌在199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大学毕业联欢会上,几乎都会被唱起,几乎都会把现场情绪烘托到一个高潮。

“走从未走过的路,尝试想象中的生活。”这是他们毕业时兴奋的心迹。

前辈们毕业时的困扰和需求在他们身上依然存在,但他们的眼光毕竟已经超越了城市,甚至超越了国门。

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中教师刘江波已经带过几届高三毕业班了,至今珍藏着学生们的毕业留言册。“学生们大学毕业后还会集体

组织返校,回来看望一下老师。”他说。

他是教政治的。这门课对现在学生们来说,可能是最不好教的。当然,如今的教材变动也很大,要适应现在的形势。“学生们高中毕业就有出国深造的,大学毕业后出国的就更多了。”

郭澄澄是2013年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院本科生,刚入学就已经详细了解了将来考取台湾大学研究生的规程,并且按照这些规程制定了大学四年的计划。她从小就喜爱中文,手机、电脑以及日常练习写作都是繁体字。高考时她坚决抵制了家长让她出国就学的企图。她的个人计划是:本科在北京,研究生去台湾,然后到欧美游学。

对他们这代人来说,世界就是世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80后、90后的毕业生们,小学和初中还有毕业留言册,而到了高中和大学,几乎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有人人网,有QQ,有微信朋友圈,到处可以很方便地说话聊天、贴图看圈。

“现在沟通太方便了,大家随时都能联系得到,所以都不怎么时兴写留言册了。”北京印刷学院2005届毕业生吴丽娟说,“这年月,很少会彻底失联。”

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高校,我们都看到了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毕业纪念视频和微电影,有的水平相当高,甚至有专业大牌剪辑师的协助。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距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你们都在忙什么呢?”

这位学生回答说:“我们很忙。忙着找工作,忙着和即将各奔东西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忙着组织各种毕业旅行。还有些更务实的,忙着做生意,在校园里挣最后一笔钱。”

怀念是要等到岁月积累之后。处在当下的年轻,是不会毕业的青春。

摘自2014年6期《中国周刊》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34.英国值得相助
7月29日星期一早上,柯克开车送多诺万去了南面的海滨,在那里他们参观了用于训练海军官员和水手的海军岸边基地。柯克一再告诫多诺万,英国向他展现了最好的情况,并坚信精明的多诺万对此应该有足够的洞察。第二天早上,多诺万参观了皇家空军海岸指挥部,然后,返回伦敦参加保守党议员南希·阿斯特在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家中举行的小型午餐会。下午,多诺万参观了位于埃塞克斯的一个战斗机飞行中队,然后乘坐皇家空军飞机去了轰炸机指挥部。多诺万在那里度过了一夜并与刚执行完轰炸德国的投弹手们进行了交谈。

在英国期间,多诺万大受欢迎,他接连收到部长、部门主管、官员和各大家族的邀请。和他进行过会谈的有丘吉尔在议会的私人秘书布伦达·布拉肯,这位一头红发的爱尔兰人是一名商人并担任议员。多诺万还会见了艾伦·布鲁克爵士,他是新上任的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多诺万拜访了精明善辩的欧内斯特·贝文,现任劳工大臣的前工会领导人。他身材魁梧却有一双小而闪烁的眼睛。贝文描述了组织有序的劳工和工人阶级对战争体现出的坚定支持,这让多诺万对贝文刮目相看。供应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带领多诺万参观了军工制造厂,并把他也介绍给了工人们。

多诺万从军情五处收到了报告,政府对从事破坏活动的可疑外国人实施了扣押。他还会见了经济大臣休·道尔顿。他于一周前刚接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命令,负责一个新的旨在从事游击战的秘密组织的运作:特别行动委员会。丘吉尔对道尔顿下的命令是“让欧洲燃烧起来”。道尔顿将关于经济战的报告交给多诺万让他带回美国,并简要介绍了英国海军封锁欧洲的情况。

8月2日星期五,这是多诺万在英国的最后一天。他和李及几名大使馆同事在克拉里奇饭店进行了长时间的工作早餐。这位武官很宽慰地发现,与一系列的大人物会谈之

后,从国王到丘吉尔,多诺万同意了武官们的结论,他也并非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多诺万打赌英国会有六成机会打败德军。多诺万同时还要求向他提供一系列报告,以便呈送到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桌上。

那天晚上,海军上将戈弗雷邀请多诺万去他伦敦郊外的宽大住宅共进晚餐。两人聊到凌晨2点,多诺万挑明了自己的结论,一切都让戈弗雷很满意,他立即打电话将这些结论一向上汇报了。关于英国是否“认真对待这场战争”,是否“值得支持”这些问题,多诺万的答案是“绝对如此”。英国既不会屈服于空袭,也不会屈从于大规模入侵。他已经见证了“不列颠民族的精神特质:这是取得胜利所不可估量的因素,而与乔·肯尼迪忽略了这些因素”。多诺万的观点并不只是基于超乎寻常的指标和数据,而且是根据英国部队,特别是皇家空军的素质,英国军用机场的分散性,都让纳粹德国空间很难占到空中优势,及根据英国海岸线的防御情况。

多诺万相信,英国值得相助,而且美国应该提供帮助。他告诉戈弗雷:“还有时间让美国提供援助,包括物资和经济两方面的援助,从而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还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相助,我们就该马上行动。”他将带着具体援助内容的明确方案回国,即包括美国驱逐舰、飞机和轰炸机、枪支、大炮,美国雷达引导的轰炸瞄准技术,这对高海拔准确投弹非常关键,用于训练英国飞行员的美国军用机场使用权,以及情报事宜的合作。多诺万坚决的态度让戈弗雷十分高兴。

最后,多诺万表明,他有一个关于增强双边外交关系的提案。除了“提名一位明智的大使”,他还打算敦促富兰克林·罗斯福委任“一位明智的豪斯上校”。此人应该来回奔于两国之间,让各国在对方领导人脑海里保持“新鲜感”。他应当能够识别“能让两国互相谦让与协作的所有途径”,他同时解释了一些棘手问题,如涉及国家主权和尊严,或者应该避免本该忽略但太过坚持要求对方让步的问题。毫无疑问,多诺万上校把自己想象成了这个“明智的豪斯上校”。

35.与英法公司斗下去

“诸位,让我讲几句。”主持会议的阿祥觉得可以讲话了,他站起身来,向大家摆手道:“刚才承德哥的意见大家都听到了,我也表态,我是支持阿德哥意见的,至于张老板问啥时候可以收场,我想没有人可以打包票。现在阿拉与英法公司的竞争正在进行,阿拉今朝一定要做出决定,我的意思是,阿拉是不是可以先定一个期限,与英法公司再斗上3个月,如果3个月以后英法公司还要竞争,阿拉再召开董事会研究,你们看这样好不好?还有,刚才承德哥表态可以收购一些小户的股金,如果出让股份的人较多,我也可以收购一些。”阿祥嘱托小股东代表的董事去统计一下,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出让股份。这次董事会作出决定,继续与英法公司争斗下去,英法公司船票卖啥价,阿拉就卖啥价!

两天后,代表小股东的董事告诉阿祥,他们小股东几乎没有人愿意出让股份。这让阿祥很安慰。

客轮公司与英法公司的客运航线竞争互不相让。时间过去两个多月了,阿祥每天注视着公司的报表,现在,公司已经亏损2万多元。令阿祥担心的是,英法公司似乎没有停止竞争的迹象,他们甚至于推出买票送礼的举措,让阿祥他们已经很可怜的上客率又损失了一些。

布朗先生这半年多日子很不好过。他是英吉利银行的大班,也是英法船运公司大股东。从客轮公司开辟申甬客运航线以来,英法公司的日子就开始难过了。从清明后,英法公司与客轮公司客运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英吉利伦敦总部就让布朗把银行业务交给其他人处理,派他到船运公司主持工作。英法公司是英吉利银行和法国人合伙办的,英国占股份八成,法国只占股份两成。

最初到英法公司的时候,布朗非常自信,他估计那些宁波人撑不了多久肯定认输,退出申甬客运航线。所以,他接受英法公司时,尽管知道已经进入客运淡季,还是果断下令把船票再下降。那几个月,公司财务报表月月亏损几万元,他虽然有些心疼,但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他觉得不冤枉。

布朗多么怀念过去那段独自经营申甬航线的日子,那真是公司赚钱的蜜月,本来的票价,公司利润已经十分可观,后来一次次提价,这两艘船简直就是印钞机,每天大把大把的银元流水似的流进公司账上,为此,法国人提出要增加股份,大家五五开。当然,英国人不会同意的。谁知道半途杀出个程咬金,宁波人开始与他们抢夺航运市场,这一来,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了。要想回到过去的那个蜜月

时代,唯一的手段就是把宁波人整死。所以,他们才忍着大批银元流失的痛苦,下降船票与宁波人争夺市场。布朗以为宁波人不堪一击,因为他了解宁波人的实力,知道他们购买这两艘客轮,已经要向社会上召集股份了。这样的实力,怎么是他英吉利银行做靠山的英法船运公司对手?但是布朗错误估计了宁波人的战斗力。从卧底那里知道,清明后客轮公司召开过董事会,言明降价暂且先试3个月。但是3个月以后,他了解宁波人已经没有资金维持客轮继续经营下去了,就在他以为宁波人应该举手投降时,又是那个章承德杀出来了。那个章承德居然出资5万大洋,这才使这场竞争继续下去。

布朗心里有数,章承德这5万大洋是扔了水漂了——这5万大洋能挺过几天?要知道,凭借他英吉利的实力,就是再挺一年也绝无问题。但是可恶的是,章承德的5万大洋,让他们又流失了宝贵的赚钱时间。布朗也清楚,两家这么拼下去,他们的损失要比宁波人大三倍多。为啥?同样的票价,多数宁波人当然选择同乡人的船,而这种亏损的差距就在上客率方面。让布朗最担心的是,随着年关逼近,客源越来越多,到时候宁波人把船票恢复到5角,那么这场争斗一时就难以结束,如果这样,他们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对此,法国方面已经多次提出要同宁波人妥协,对法国人,布朗当然不去理会,但是对下一步怎么秒杀宁波人,布朗是动足脑筋的。他决计用一着狠招,一剑封喉杀死宁波人的客轮公司。布朗的方案已经伦敦总部批准。他要从别的航线调用4艘客轮,在客运旺季实行1角钱低票价措施,用自己的大出血代价让客轮公司死亡。

宁波商人

徐志明

